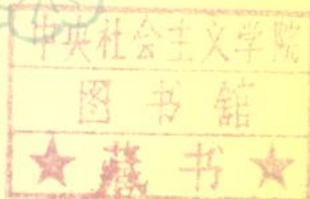


当代文学概观

张 钟 洪子诚
余树森 赵祖谟
汪景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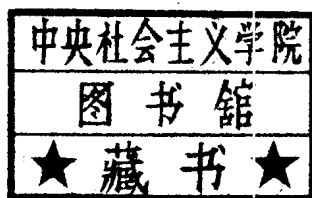
当代文学概观

张 钟 洪子诚 余树森 赵祖谟 汪景寿



200188974

55271



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文学概观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学院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357,000字

1980年7月第一版 1983年7月第3次印刷

印数:55001-105000册

统一书号: 10209·3 定价: 1.40元

目 录

前言	(1)
----------	-----

第一编 诗歌创作

一 概述	(15)
二 在探索的道路上	(23)
三 艾青、田间的创作道路	(32)
四 阮章竞、李季的诗	(40)
五 闻捷、李瑛的诗	(48)
六 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诗人(一)	(56)
七 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诗人(二)	(65)
八 优秀的诗人郭小川、贺敬之	(75)
九 《天安门诗抄》与诗歌创作新貌	(84)
十 毛主席诗词	(91)
十一 少数民族诗人和民间叙事诗	(97)

第二编 散文创作

一 概述	(104)
二 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	(111)
三 刘白羽的散文	(116)
四 杨朔的散文	(121)
五 秦牧的散文	(126)
六 酿造诗意的作家	(133)
七 艰苦创业精神的赞歌	(141)
八 艰苦岁月的缅怀与颂赞	(151)
九 徐迟、黄钢的报告文学	(156)
十 巴金、冰心的散文	(163)
十一 革命的史传文学——传记、回忆录	(171)

第三编 戏剧创作

一 概述	(176)
二 农村题材的剧作	(182)
三 军事题材的剧作	(187)
四 工业题材的剧作	(192)
五 人民艺术家老舍	(196)
六 《霓虹灯下的哨兵》	(203)
七 《千万不要忘记》等反映青年一代的剧作	(207)
八 《洪湖赤卫队》与新歌剧	(211)
九 成长中的喜剧	(215)
十 独幕话剧和战士小戏	(220)
十一 “古为今用”的历史剧	(225)
十二 反映少数民族斗争生活的剧作	(232)
十三 粉碎“四人帮”以来的话剧创作	(236)

第四编 短篇小说创作

一 概述	(245)
二 在新生活面前	(252)
三 革命斗争历程的记录	(259)
四 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和李准的创作	(266)
五 王汶石和杜鹏程的短篇小说	(274)
六 赵树理、马烽等山西作家的短篇小说	(281)
七 “干预生活”的口号和作品	(288)
八 工业题材短篇的成绩和问题	(294)
九 风格多样化与茹志鹃的创作	(300)
十 新的突破和开拓	(306)

第五编 长篇小说创作

一 概述	(312)
二 建国初期的小说创作与《保卫延安》的出版	(316)
三 赵树理的《三里湾》与周立波的《山乡巨变》	(323)

四	五十年代工业题材的中长篇小说	(332)
五	《青春之歌》与《小城春秋》	(345)
六	《红日》与《林海雪原》	(357)
七	梁斌的《红旗谱》	(367)
八	杰出的作家柳青	(377)
九	抗日战争的壮丽画卷	(388)
十	《三家巷》、《苦斗》及其讨论	(399)
十一	悲壮的史诗《红岩》	(412)
十二	《风雷》与《艳阳天》	(423)
十三	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长篇小说	(437)
十四	历史小说《李自成》	(449)
十五	新时期的长篇小说与魏巍的《东方》	(462)
后 记		(474)

前 言

一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历史的巨手同时揭开了我国社会主义当代文学的篇章。

从一九四九年七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到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整整经过了三十年。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随着重大社会变迁，很自然地划分为三个时期。即：一九四九——一九六六，十七年时期；一九六六——一九七六，“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九七六——现在的三年，开始进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时期。

当代文学在第一个时期，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它的道路是不平坦的，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在第二个时期里，当代文学遭到了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十年浩劫，作家队伍遭受了严重摧残，也经受了严重的考验，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林彪、“四人帮”能够控制和利用的是极少数。打倒“四人帮”之后，当代文学随着历史新时期的到来和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出现了一批引人注目的作品。

从三十年来的伟大而又艰巨的历程可以看到，当代的作家队伍，是一支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队伍，是一支与劳动人民血肉相联的队伍，是一支受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的队伍，是一支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富有高度责任感的队伍。

回顾三十年来我国当代文学走过的道路，总结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研究创作状况，探索对文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今天，已经是一项迫切的任务。

考察三十年来文学创作的状况，可以看到，文学对中国人民长期的民主革命斗争的历程，作了比较充分的描绘，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作品。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一百多年，中国人民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推翻三座大山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斗争，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题材。长篇小说《红旗谱》（梁斌）、《红岩》（罗广斌、杨益言）、《青春之歌》（杨沫）、《风云初纪》（孙犁）、《林海雪原》（曲波）、《小城春秋》（高云览）、《三家巷》（欧阳山）、《红日》（吴强）、《保卫延安》（杜鹏程）、《铁道游击队》（知侠）、《苦菜花》（冯德英）、《铜墙铁壁》（柳青）、《战斗的青春》（雪克）；中短篇小说《政治委员》（刘白羽）、《黎明的河边》（峻青）、《党费》（王愿坚）、《百合花》（茹志鹃）；话剧《战斗里成长》（胡可）、《万水千山》（陈其通）、《茶馆》（老舍）、《豹子湾战斗》（马吉星）；歌剧《洪湖赤卫队》（湖北省实验歌剧团）、《江姐》（严肃）；长诗《杨高传》（李季）、《复仇的火焰》（闻捷）等等，这些优秀作品组成了一幅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的壮丽画卷。这方面的创作成就显著，是有原因的。大批作家经历过民主革命的火热斗争，有着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深切的生活感受，这为作家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如何认识和理解民主革命的历史过程，从理论和实践上也已得到比较清晰明确的解决，这也为作家提供了方便条件。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在我国是前无古人的。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社会生活等等方

面,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变革的现实,对于作家来说,都是一个新的生活领域。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即文学如何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的问题,三十年来,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一般说来,一九五六年以前的社会现实,在文学创作中反映得比较充分、深刻,艺术成就也较高。五十年代前半期,社会变革在正常的途程上胜利发展,大批作家怀着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热情和对新生活的热烈向往,投身到现实中去。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首先在老舍的话剧《龙须沟》中反映出来,老作家郭沫若、巴金、曹禺、何其芳、丁玲、夏衍、艾芜、沙汀等,以他们的新作为表现新生活作出了贡献。贺敬之的《放声歌唱》和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等诗篇,表达了高昂的时代精神。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沈西蒙等)、《槐树庄》(胡可)则通过一支部队的思想斗争和一个村庄的变迁,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农村的巨大变革,很容易为与农民保持长期联系的中国作家所理解,长篇小说《创业史》(柳青)、《三里湾》(赵树理)、《山乡巨变》(周立波)、《风雷》(陈登科)等,描绘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刻过程。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命运和道路问题,在《上海的早晨》(周而复)中得到了比较深刻的反映。《在和平的日子里》(杜鹏程)、《百炼成钢》(艾芜)描绘了工业建设的沸腾场面。这些作品,构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初期波澜壮阔的图景。

一九五六年,三大改造的完成和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使我国社会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革命将进入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整个社会力量将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适时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反映了新形势对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新要求。文学创作和思想理论空前活跃起来。在这转折时期,文学创作出现了一种新的突出的现象,即涌现了一批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揭露孽生在社会主义现实中的腐朽事物的作品,鞭挞官僚主义、思想僵化者,揭露蜕化变质、权力拜物教者。后来收集在《重放的鲜花》一书中的一些作品就

是代表，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杜鹏程)和《水滴石穿》(康濯)也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这批作品的出现，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的。社会的转变，总是要为自己扫清道路的。在新的转变时期，这些作品中所暴露、批判的东西，正是历史前进的障碍物，这些作品是为扫除障碍廓清道路而呼喊的。不幸的是，由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这些作品及其作者，几乎都被当作“障碍物”扫掉了。

文艺战线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以及对一批作家作品的错误批判，使作家在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的问题上，遇到了波折。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减弱了，出现在一九五八和一九五九年的大量浮泛粉饰之作，充斥报刊。这时期也出现了长篇小说创作的高潮和国庆十周年献礼影片的优异成绩，但多数是取材于革命历史斗争的作品，也因为在此之前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为一批优秀作品的出现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这时正是收获的季节。但是一些作家在如何反映现实的问题上，出现了拘谨、滞重的状态。虽然也有《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赵树理)这样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却存在作家孙犁所说的状况：“赵树理的作品从一九五六年以后迟缓和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因此，就失去了当年的青春泼辣的力量。”(《谈赵树理》，《天津日报》一九七九年一月四日)作家康濯在回忆中写道：“五七年受批评后便以为自己看农村阴暗面多了些，五八年再到农村，就因之而过分重视了一封的现象，并跟随了一些不甚理解但又认为应该跟上的指示，迷于表面，未能深入，以至又偏到‘左’边而在创作中宣扬过浮夸和‘五风’”。待到六二年“我也在大连会议上回顾、检查了过去，并提出了迫切需要反映农村复杂的斗争、严重的问题和内部矛盾。以后回湖南参加了农村社教，并发表了一篇写农村矛盾、斗争比较复杂的短篇小说《代理人》；但很快又联系到大连会议，把小说指责为暴露了黑暗，又犯了‘现实主义深化’和‘写中间人物’的右倾错误。”(《再谈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评论》，一九七九年第六期)康濯的这段经历和遭遇，

是很有代表性的，反映了一部分作家在反映现实问题上的波折和惶惑不定的情况。

“大跃进”所带来的挫折，使人们的头脑清醒起来。长期存在于文艺指导中的“左”的倾向已经成为文艺事业发展的严重障碍。周恩来同志一九六一年六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连同他一九六二年二月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和陈毅同志三月在广州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对建国以来文艺运动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发展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思想，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根本性的正确主张，那就是充分解放文艺生产力，坚持“双百”方针，发扬艺术民主，尊重艺术规律。文艺方针的调整给文学创作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小说、诗歌、话剧的创作都有新的收获和发展，散文创作获得丰收，部队文学创作十分活跃。

随着文学真实性浪潮的高涨，文学创作还出现了另一种现象，那就是历史题材作品的涌现。《杜子美还家》（黄秋耘）、《陶渊明写挽歌》（陈翔鹤）、《李自成》第一卷（姚雪垠）、《胆剑篇》（曹禺）以及新编历史戏曲《海瑞罢官》（吴晗）、《谢瑶环》（田汉）、《李慧娘》（孟超）等。这些作品虽然不是对现实的直接反映，却是有感于现实而发的。这些作品有歌颂农民英雄，激励人民愤发图强的精神和吸取历史教益的意义，不可讳言，也确有讽谏现实的客观效果。特别是“为民请命”的思想，这在当代文学中还是少有表现的。尽管后来给“为民请命”定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但是，在当时文学中出现这一思想却是反映了现实中一种很深刻的矛盾，背离客观实际，违背人民的利益，这在某些领导者和实际工作中是确实存在的，而且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些作品不过是隐晦曲折地表达了人民的呼声，通过历史故事提出现实中的严肃问题。象对权奸的揭露（《李慧娘》），这怎能不触及现实中的权奸（林彪、江青及其顾问一伙）的神经呢？后来他们那样气势汹汹、兴师问罪、大动干戈就不难理解了。

一九六二年以后，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另一现象，就是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而出现的应时之作——从理论出发，剪裁现实加以图解的作品，一时流行起来。与五十年代初出现的公式、图解的作品不同，那时有一些作者确实出于政治热情而对生活缺乏体验，公式、图解也是很粗糙、幼稚的。这时，服从政治需要的色彩更为浓重，生活材料的剪裁也高明多了。随后出现的全国规模的批判运动，使文学反映社会现实问题，遇到了严重的危机。

事情继续朝着极端发展，林彪、“四人帮”专政文坛，使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走到了恶运的顶头。瞒和骗，成了“四人帮”控制下的文艺的基本特色。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多的波折呢？

这与政治形势的变化、动荡有更大的关系，也与长期以来对待现实主义的态度有密切的关系。

现实主义，是文学的最重要的创作方法和思潮。它把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社会主义文学对这一文学传统加以继承和革新，发展成革命现实主义，与其他好的创作方法（如革命浪漫主义）同时并用，这本来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在当代文学的历史途中，现实主义屡屡受到限制和打击，直到“四人帮”把它当作“黑论”打入地狱。

稍加回顾一下历史吧。早在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时，就牵连了“现实主义”、“写真实”。真实地反映现实，真实地反映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即“写真实”，这本来是现实主义的核心内容。长期以来，“现实主义”和“写真实”的文学主张，无形中成了“旁门左道”。但是这股文学潮流是很强盛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即五六年面临社会的一个新的转折时期，它以“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干预生活”等口号又活跃起来，相应的一批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竞相生长。这股文学潮流并不象有人担心的那样，将要形成一股以暴露为能事的黑色浪潮。认真地考察一下，当时这股文学

潮流不过反映了社会主义现实中新的矛盾，是为新的历史进程扫除障碍的，它将为开拓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的广阔园地创造必要的条件。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一回给现实主义潮流的打击是严重的。五八年以后的一个时期，在倡导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时，在当时的社会气氛下，强调写理想，写明天，写将会发生的事，离开现实主义的基础，给文学创作带来了有害的影响，已经为历史所证明。文学的现实主义潮流在一九六二年又以“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再次恢复了生机。这一年的八月，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作家们对这一时期社会现实中的种种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对文学的状况和时弊，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提出“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以改变文学创作中的脱离现实，掩盖矛盾，粉饰、浮夸，说大话，唱高调的不良风气。主张“现实主义深化，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强大的革命浪漫主义，从这里去寻求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道路。”（《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一九六四年第八、九期合刊）并且提出以现实主义深化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过程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这些革命现实主义的铮铮良言，无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还是在今天来看，无疑都是正确的。这一次革命现实主义潮流的崛起，时间也不长，它所遭到的打击比五七年那一次更有甚之。连为人民所公认的革命现实主义的杰出大家赵树理，也受到了指责。这件事所起的作用无异于宣布对革命现实主义的完全抛弃。在赵树理遭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生命垂危的时候，对他的女儿谈到他的一生时，悲愤地说：“近些年来，我几乎没有写什么，因为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说，只好不写。”（赵广健《旧居门前》，《曲艺》一九七九年第八期）“近些年来”，当然指的不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这时的赵树理不仅失掉了写作的权利，而且也失掉了生存的权利。赵树理的深沉的悲愤，说明作家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在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问题上，走着艰难的道路。从六三、六四年开始的这一次，

从贯彻“两个批示”，批判“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到批判《海瑞罢官》，事情正在起着质变，因为林彪、江青及康生一伙，已经插手进来，利用文艺问题推行一个更大的政治阴谋。待到他们完全控制了文艺战线之后，就强行以“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的主观唯意志论，取代了所有的进步的创作方法。

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揭开了当代文学新时期的序幕。打倒“四人帮”，清除了对文学事业为害最烈的祸害，从政治上、思想上、艺术上解放了文艺生产力。当代文学创作，象喷发了的地火，放出光芒，显出威力。

以满腔义愤揭露“四人帮”的作品，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共鸣。描绘人民群众同林彪、“四人帮”之间尖锐斗争的作品，获得了社会的普遍赞扬。《班主任》（刘心武）、《丹心谱》（苏叔阳）、《于无声处》（宗福先）、《神圣的使命》（王亚平）等，是有代表性的。以满怀深情歌颂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戏剧创作，如《报童》（邵冲飞等）、《曙光》（白桦）、《西安事变》（甘肃、西安两话剧团分别创作）、《陈毅出山》（丁一三）等，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徐迟）、《亚洲大陆的新崛起》（黄钢），适应四个现代化的历史要求，为中国知识分子争得了应有的文学地位，是一个新贡献。老作家曹禺的话剧《王昭君》又为历史剧增添了光彩。柳青的《创业史》（第二部上卷）以作家生命的最后一息，修改出版。在打倒“四人帮”，庆祝胜利的欢乐中，诗歌朗诵活动，获得了那样强烈地反响，是当代文学史上少见的盛事。

林彪、“四人帮”横行的灾难岁月，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内伤和外伤，遗留下堆积成山的社会问题，以及存在于新时期的种种妨碍四个现代化的阻力和社会弊病，促使作家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社会批判的战斗精神，表达人民的爱和恨，反映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小说《醒来吧，弟弟》（刘心武）、《伤痕》（卢新华）、《人妖之间》（刘宾雁）、《人到中年》（谌容）、《剪辑错了的故事》（茹志鹍）、《李顺大造屋》（高晓声）等，话剧《未来在召唤》（赵梓雄）、《报

春花》(崔德志)、《权与法》(邢益勋)、《救救她》(赵国庆);诗歌《在浪尖上》(艾青)、《小草在歌唱》(雷抒雁)等,是促使人们惊醒感奋,为社会主义去斗争的好作品。同时,为新长征路上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塑象的作品,如《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等,也不断涌现出来,中篇小说正在兴起,长篇创作也在不断涌现。

打倒“四人帮”之后的三年,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与人民的关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密切,作家对现实的观察、体验,比以往更为深刻全面了,作家对唤起人民克服障碍、鼓起为实现四化而斗争的勇气,负起了重大的社会责任。文学对人民的经历、命运、斗争、呼声、愿望、种种矛盾、种种人物,做了真切的激动人心的反映,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肯定。文学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也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革命现实主义的精神得到了发扬。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并肩前进,或者协同,或者结合,必将创造文学繁荣的新局面。

三

在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政治对文学的影响,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复杂的社会现象。

、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可以给文学的发展以积极的影响,社会重大政治变革也总是在文学上反映出来。文学本身也是有倾向的,也要在社会上发挥它的政治效能。当代文学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发挥的积极的政治作用,应给予高度的评价。文学不能脱离政治,就象它不能脱离社会一样,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在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在文艺战线,发生过多次政治性的运动,其规模也越来越大,直至变成整个社会的政治运动。用政治运动解决文艺问题,或者把文艺思想斗争变成政治斗争,实

实践证明，其社会效果是不好的。其中常常发生两种情况：或者用政治运动解决文艺思想问题，往往文艺思想问题并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或者用政治斗争代替文艺创作或文艺理论中的是非之争，其结果是容易混淆两类矛盾，打击了正确的东西，助长了错误倾向。五七年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就是一个历史教训。长期以来，“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被当做先从文艺界抓阶级斗争动向的行动口号，因此所造成的混乱和恶果，给文学事业带来的损害是不可轻估的。至于林彪、“四人帮”把文艺变成其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工具，大搞“阴谋文艺”，这更是严重的历史教训。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长期以来被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所代替，它不仅成了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而且成了文艺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的思想来源。写中心、演中心，要求文艺图解具体的政策，要求直接宣传某种政治观点，要求直接为某条政治路线服务，都可以从文艺服从政治的观点中找到根据。追随一时的政治潮流之作，使得很多作品在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中失掉了生命。真正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是那些反映了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体现了历史发展趋势、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和时代要求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才具有为实现党和人民的伟大目标而发挥政治作用的积极意义。

一个时代的伟大作家，无不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先驱者。杰出的社会主义作家，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通过对社会现实和历史的深入地观察、体验、研究、分析，可以获得对现实和历史独到的创造性的发现。把“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恩格斯语）与高度典型的完美艺术形象统一起来，反映出时代的风貌，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同样可以达到时代的高度。对我国社会伟大而又曲折复杂的变革过程，做到真实深刻的反映，没有作家对社会实践过程深邃独到的认识，而只靠对各个时期的政治口号依样画葫芦式的图解，那是不可能达到的。因

此，重视文学艺术本身的规律性，这绝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小事。

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成果，构成这个时代文学史的主要内容。我国三十年来的当代文学的发展，受我国经济、政治、思想、阶级斗争、社会变动等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社会的重大变革的影响，这是不应忽视的。但是，文学的发展还有其自身的规律，这是更不应该忽视的。马克思论述过艺术的一定的繁荣时期与社会的一般发展，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的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说明，艺术的发展有其不同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社会主义文学当然也不例外。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涉及到：

文学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社会主义文学与过去时代的文学有继承、借鉴与发展的关系，这是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之一。我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都与当代文学有着民族文化的血缘关系。社会主义的当代文学，仍然是我国民族文学，在思想性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在传统、形式、格调上应该是民族的，一个优秀的具有鲜明特点的民族文学，才会在人类文化史上放出异彩，占有地位。当代文学又是我国多民族的文学，各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借鉴、互相影响，这是自然的，但仍然应该是各有民族特点的文学。民族文化的传统，在民族的生活中是根深蒂固的，有相当的稳定性，要革新和发展，又要沿着民族性的规律前进。民族的文学并不是排外的文学。随着国际交往，别国文学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对本民族文学产生影响，增加民族文学的新因素，这在我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上已经是事实。这应该属于文学的继承、借鉴与发展的关系之内。但是，文学的民族性并不因此而改变。我国当代一些有成就的作家，他们的作品的民族色彩是鲜明的。我国当代文学的民族特点问题，是早已引起重视并在逐步解决中。

创作方法，这是另一个属于文学创作本身的问题。创作方法，不仅与一定的文学思潮有联系，更重要的还与长期的人类艺术实